

屠芬集

苏祖德 遗作





1931 年学生时代摄于厦门



1951 年摄于印尼泗水



1981 年 3 月摄于百洞山



1983年6月苏祖德和印尼读书生活会成员章臣恒（右）（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民促委员会主委）、妻子蒋毓英在北京合影



1952年与妻子蒋毓英于鼓浪屿寓中合影



1974年夏天子女们从祖国各地回鼓浪屿看望父母时合影



1982年秋季子女回家探亲时合影



1982年7月，中新社专稿部在武夷山召开分社专稿组会议，在厦门日光岩参观，苏祖德向与会代表讲解



与中国新闻社专稿部主任
王瑾希（左）合影



游鼓浪屿菽庄花园，苏祖德（右站）
向与会代表讲解



1983年5月在北京与
妻子蒋毓英合影



1983年6月离北京往
长沙看望二女儿与妻子蒋
毓英在站内合影



1983年5月在北京车站
与妻子蒋毓英合影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五日

推荐登记表

福建新闻工作者协会

若姐妹同志已结婚了。但因本批评意见未
在案。因此。仍予以推荐。整给予名誉奖励。

福建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同意若但既因各社为1984年度宣传优秀
社团。此致。

市立中醫院 總務課

姓名	苏德德	曾用名	苏军	别名	
性别	男	年龄	24岁	籍贯	存门
原籍	安徽 亳县	职业	学生	现居	上海静安
住址	中国新闻社 新建大楼			职业	编辑
民族					

[illegible]

王 惠 元

生 源 先 进 事 迹 (按姓名拼音字母顺序)

年秋，理中君于常居有年，慨然归二子，与
其子小，以病故。其子小，以病故。其子小，
以病故。其子小，以病故。其子小，以病故。

附件：领导批示、针对性强、汇报上稿、刊物、书刊、
刊物、书刊、表、物。

我作为华与华创办的调查研究员，在2004年时赴四川，给通远县做广告营销策划。在统计时，因时间紧张，仓促的统计，错漏，和未统计通远县外中间就有用过的媒体的情况。

重視時間推進其原理。以表格管理時間。能如
此反省組織。已在基礎地整理土地。按時按土。因的
的而而地整理土地。其路或不定。

中新社福建分社的推荐表



华侨大学校长办公室致谢函

苏宿莽先生赠送
华侨大学图书馆图书个别登记簿

- | | |
|--------------|-------------------|
| (一) 平装、洋装图书共 | 2,225册 |
| (二) 线装图书共 | 1,198册 |
| (三) 外文书籍共 | 70册 |
| (四) 新旧期刊共 | 787期 |
| 共图书 | 3,493册 (叁仟肆佰玖拾叁册) |
| 期刊 | 787期 (柒佰捌拾柒期) |

(图书、期刊详细目录附后)

华侨大学图书馆
1965.7.

华侨大学图书馆收到赠送图书个别登记簿

蘇祖德先生九十誕辰紀念
胸懷海岳，一心報國盡風流
筆走龍蛇，八閩山水皆文章

中新社福建分社 周景洛 

二〇〇三年八月五日

悼 苏 宿 莽

——代序

赵家欣

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在国统区的文化围剿双管齐下。十九路军发动的“闽变”失败后，蒋军大批入闽，加强法西斯反动统治，白色恐怖日趋严酷。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日子里，厦门进步文艺青年纷纷拿起文艺这一武器，同敌人进行战斗。这一时期，文艺团体纷纷出现，文艺副刊和文艺期刊有如雨后春笋，其中有苏宿莽（即苏祖德）主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创刊的《鹭华》文艺月刊。尽管刊物只出版五期就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扼杀，编辑人员和主要撰稿人或投入狱中，或逃亡海外，但由于刊物内容富有战斗性和时代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惶恐和忌恨。

一九七九年，《文献》第二辑刊有戈宝权同志写的《谈在美国发现的鲁迅和茅盾的手稿》，介绍了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为美国友人伊罗生编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选《草鞋脚》选题的经过和与此有关的若干封书信。文章在介绍该小说集全书目次之后，有一段话说：全书后面附有茅盾编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对《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月刊）、《创造月刊》、《奔流》（月刊）、《萌芽》（月刊）、《拓荒者》（月刊）、《巴尔底山》（周刊）、《前哨》（周报）、《文学导报》（半月刊）、《北斗》（月刊）、

《十字街头》(半月刊)、《文学月报》、《文艺》(月刊)、《春光》(月刊)、《文学杂志》(月刊)、《文艺月报》、《科学新闻》(周刊)、《文艺新闻》(周刊)、《榴华》(周刊)、等十九种期刊作了介绍。“鲁迅还在后面补写了一条厦门出版的文艺刊物《鹭华》”。关于《鹭华》的原注原文是：“《鹭华》(月刊)，厦门出版。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创刊号。一九二八年已有《鹭华》，附刊于日报上，不久停止。这是第三次的复活，内容也和旧的不同，左倾了。作品以小说、诗为多，也有评论及翻译。”

祖德读到这段文字，欣喜万分，特地写了一篇《鲁迅与厦门“鹭华”月刊》，刊登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文章说，《鹭华》创刊后，他们把几本第一、二期刊物托上海内山书店转送鲁迅先生，目的是请他老人家指教。大约过了一、二个月，就收到了从莫斯科航邮寄来的一本《国际文学》英文版，封面打有“请交换”的英文印章。他们都很高兴，琢磨了半天，一致认为这必定是鲁迅先生向外介绍的，因为那时《鹭华》只在闽南一带发行，还没有寄到外省去。这个生命短暂的地方性刊物，竟然引起鲁迅先生的重视，把它作为“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物”向外国读者介绍，由此可以看出它在反文化围剿中所发挥的进步作用。

一九三四年前后，祖德是厦门大学学生，他用苏宿莽的笔名，在《鹭华》和当地的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艺作品。女作家谢冰莹对他的作品作了较好的评价。在《鹭华》创刊之前，叶帆风编印了一本《厦门青年作品选集》，选集第一篇就是宿莽的小说《波罗蜜》，冰莹为选集写序，她说：“在许多小说里，

我最爱《波罗蜜》和《抗》两篇。宿莽君的文字是流利的，读起来的确象吃波罗蜜一般……在描写和技巧上，宿莽君的这篇文章是很适合大众文艺风格的……”同时，冰莹也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抗日战争前，祖德从南洋回厦门，写了一些反映南洋社会现实的小说、通讯、报告文学等作品，寄给鲁迅先生，先后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发表。祖德是三十年代厦门比较有成就有影响而勤奋创作的青年作家之一，当时我还是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作品。

抗战军兴，祖德再次南渡，海天茫茫，岁月流逝，匆匆四十余载。我既看不到他的文章，也不知他的讯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知道祖德早已回到祖国，在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工作多年。同在一个城市，由于人为的原因，竟无缘会晤，交臂失之。当我去拜访他时，相对之下，竟是鹤发曲背两老人了！这时，他正从文革中被迫退休恢复工作，我也改正了多年蒙受的不白之冤。喜慰之情，非言可喻。从此，我时常到中新社叙旧，他也到过我的住处。祖德很健谈，记忆力比我强。我们共同回忆三十年代厦门文艺界的人和事，叙谈四十多年来的欢欣与辛酸，怀念历经坎坷不幸过早谢世的青年时代朋友。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作家、老编辑，精神奋发，辛勤劳动，一篇篇报道祖国家乡讯息的文稿，在他的润饰下发往海外，在他的一再催促下，近年来，我也写了几篇怀念旧友的文稿，经他亲自审校发出。今年初夏，他赴京开会前，在中新社最后一次晤谈时，仍然神采奕奕，丝毫看不出有疾患在身，孰料这次会面，竟成永诀。

自从知道祖德身患不治之症，回厦门家乡治疗休养后，我一直记惦着他的病情，两个月来，经常到中新社探询情况。虽然奇迹难于出现，但我希望听到病情有所好转的消息。七月廿七日，我怀着焦虑的心情，给祖德写了一封信，用的是问候的语气，因为听说他还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致命的恶疾。二十多天过去了，复信始终没有到来。八月十七日下午，我和往常一样，来到中新社，一进门，社长林彦群同志用低沉的语调告诉我：“老苏已于今早去世了！”这一讯息，使我感到突然，感到悲痛。故人多凋谢，知交半零落，祖德同志的去世，使我为又失去一位志趣相同的老友而黯然神伤！

一九八三年八月廿六日晚

纪念苏祖德先生

——代序

黄 猷

苏祖德先生属于长我半辈那一代人，因此我想称他先生比同志更为合适，虽然我们是同事、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我不能说，我真正彻底了解他，年龄和经历总是会造成隔膜的。不过我确实曾经试图深入的了解他，同时了解他们那一代人。那是，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仍然为它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所唤醒，向往于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并且直接面对着大革命前后、在中国新型知识份子中间出现的分化的一代人。有的人走上了和工农大众结合的、急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有的人认同于推动民主改革而不对抗的主张，有的人选择“科学救国”或以学术立命、疏离政治，有的人进入工商界求社会与个人的发展，也有一些人还是“学而优则仕”做官去了。指点苏祖德先生在厦门大学的同班同学、先后同学，谁是谁历历可数。至于他自己，先是倾向于以文学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转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直接参与，在被追捕不得不藏身印度尼西亚之后，继续用笔战斗。他最常用、也最深爱的笔名叫“宿莽”，我没有问过他何所取义，以意逆志，他是在策励自己和宣告自己是一个潜伏的抗争者

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回来了，是怀着一颗报国和对新社会的期望之心回来的，并以宣传新中国为其终身的事业。

他被划为“右派”。不是由于他自己的鸣放、而是由于他几乎是顽固地为受批判的单位领导辩护引起的。那是一个小单位，受批判的领导是一个年青人，既无恩于他，也未必会有能使他真正倾倒的风采与修为，他的激情又从何而来呢？好多年之后，大家才逐渐理解，他所不能放弃的是新闻工作中最后剩下的一点点探索的自由，他所不平的是以势压人的政治大批判，这并不是为一个人而发的。我想，其中还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他向往革命，也为革命做出过自己的承担，但他从三十年代初期就远离中国生活在革命运动早于1928年就被镇压下去的印度尼西亚，他没有经历过中国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洗伐；他所服膺的仍然是“五·四”的民主传统，“民主集中制”对他是陌生的、以至难于接受的。他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

他被赶出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回厦门准备改行，恰有一个机缘让他得以被安排在省侨联专门做从印尼回来的一批高级知识份子、技术人员的接待、联络工作。这与其说是在政治上对他的宽容，无宁说是在做人的品格、修养上对他的理解和信任。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尽管小心翼翼，还是不免于被迫提前退休。

文革过后他好不容易争取到复职，得到“改正”，这时他重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这只是为了一个政治上的